

弘扬民族的叙事话语^①

——评赵炎秋、陈果安、潘桂林著《明清叙事思想研究》

龙钢华

(湖南邵阳学院 中文系,湖南 邵阳 42200)

摘 要:明清时期是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成熟期和高峰期,该时期的叙事理论与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叙事学的“国情”特色,具有标本或示范功能。《明清叙事思想研究》分四个层面对此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即:从体制形态看明清叙事思想;王国维、梁启超的叙事思想;报刊语境、读者意识与近代叙事思想的变化和明清小说的叙事艺术。其研究的切入点和体例设置独具匠心,视野开阔,思路清晰,尊重历史,新见迭出,从整体上凸显了明清叙事思想的大致轮廓。

关键词:明清时期;叙事文学;叙事思想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0)02-0068-03

Promoting National Narrative Discourse

——Comments on *Narrative Ideological Studie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y Zhao Yanqiu, Chen Guoan and Pan Guilin

LONG Ganghua

(Chinese Department, Shaoyang University, Shaoyang 422000, China)

Abstract: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e considered the mature and peak perio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rrative literatur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period have strong Chinese narratological features and are good examples or have good model functions into which *Narrative Ideological Studie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s made fruitful researches from four dimensions: the system forms of narrative ideology, the narrative theories of Wang Guo-wei and Liang Qichao, press context, reader consciousness and the changes of modern narrative ideologies and the narrative art of Ming Qing novel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style settings of the researches are original, the vision wide open and the mind clear. Not only is respect paid to history but also new insights and a general picture of the narrative theorie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e presented.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narrative literature; narrative ideology

叙事,在中国古代最早称为“序事”,不仅有讲述的意思,而且暗示了时空顺序,隐藏着思维的多元性,包含了异常丰富的文体乃至文化哲学内涵。将叙事当做一门学科,并使其成为一门显学,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不过,现有的叙事理论大部分来自以法国为中心的西方学者,如茨维坦·托多洛夫、罗兰·巴尔特、格雷玛斯、布雷蒙、热奈特等。他们从叙事的文本、功能、结构、时间、情境、

声音及作品的接受等方面构建了系统的西方式的叙事学理论。^{[1]1-9}

中国历来有尊史重事的传统,包含史传、笔记散文和小说在内的叙事文学,几乎占据了文学世界的大半江山。按理说,有如此丰富的叙事实践,就应该有相应的叙事理论研究;而事实上,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更多的是研究抒情言志的诗论,符合中国叙事文学实际的本土化叙事理论研究起步很

① 收稿日期:2009-11-16

作者简介:龙钢华(1963-),男,湖南新宁人,湖南邵阳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小说方面)研究。

迟。^{[2]10-16}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陈平原、杨义、申丹、罗钢、傅修延、徐岱等学者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研究,但一直持续下去进行延伸研究的不多。这种理论研究和叙事实践不对称的情况无疑是留给当代学者们一个重大而富有挑战性的课题。

要构建中国的叙事理论体系,有三个基础性的工作:一是把握中国古代的叙事思想,二是把握西方的叙事理论,三是把握中国现当代的叙事理论及叙事实践。其中,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由于容易被人忽略,因此某种意义上尤为重要。中国叙事学的学理机制如何?中国小说叙事的民族风格怎样?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能突破中国叙事学研究的瓶颈,又是走向理论成熟的标志。湖南师范大学文艺学科的一批学者基于这种理论通识和学术使命,10余年来一直在该领域里辛勤耕耘。其中赵炎秋、陈果安、潘桂林著的《明清叙事思想研究》^[3]更是中国式叙事研究的重要成果。

明清时期是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成熟期 and 高峰期,该时期的叙事理论与叙事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叙事学的“国情”特色,具有标本或示范功能,因此,《明清叙事思想研究》的选题可谓切中了中国叙事学的“要穴”;而且题目不以“叙事文学”为中心词,而以“叙事思想”为落脚点,更具有包容力和形而上的理性高度,所以题目本身就占据了叙事学的一个统领全局的制高点。

那么,如何在这一制高点上取精撮要,提纲挈领?《明清叙事思想研究》从以下方面来实现这一目标。

一是作者研究的切入点。该著的撰写者都是从本人最有研究、最有体会的地方入手,而三位作者分别在相应的研究领域从事了一二十年的研究,有较深的造诣,前期成果丰硕,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研究的质量。

二是体例设置。全书26万字分4个板块,即4章:从体制形态看明清叙事思想;王国维、梁启超的叙事思想;报刊语境、读者意识与近代叙事思想的变化和明清小说叙事艺术。4章包含了15节,虽然不能囊括明清叙事思想的方方面面,但章节的安排,体现了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点面结合、详略互补的研究思路,从整体上凸显了明清叙事思想的大致轮廓。

三是尊重历史,新见迭出。在第一章中,陈果安开宗明义指出,基于文化背景的原因,研究明清叙事思想,最需要的是一种“还原性研究”,因为“只有还明清小说一个本真的面目,我们才可能真正接近明清叙事思想”。根据这样的认识,陈果安首先抓住明清小说的“体制形态”进行由表及里的考察,

分别从“题目”与“回目”、“以诗开篇”与“诗文融合”、“入话”与“议论”、“头回”与“楔子”、“正话”与“正文”以及“小说体制形态的信息编码”等六个方面来进行研究,涵盖了该时期小说体制形态的基本层面。在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上,同样是紧扣特征,切中肯綮。如在分析“题目”与“回目”时,抓住其“诗化”、“对偶”和“警策”的特点,指出明清小说的标题无一例外地用诗化语言来揭示一篇之旨,显全篇之精神,这在中国小说标题史上可称得上是一大变革,“读题目就像读一首诗,从标题本身就能获得一种诗意。”^{[3]5}同时,标题总是对偶性的,不仅带来了文题本身的形式之美,还体现了作者构思上的对偶性思维和作品情节上的对偶性展开。而标题的“警策”性,既“提纲挈领地交代出小说的主要内容,又于整饬简练之中见出文采”。^{[3]7}这种分析,可谓一语中的。

王国维和梁启超是清末近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两个思想家、文学理论家与文学批评家。他们的叙事思想同样在古代向现代的转换时期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赵炎秋对此进行了原创性的提炼阐述。赵炎秋认为,王国维的叙事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文学价值地位观、文学内容观、文学形式观和文学形象观四个方面。在中国封建社会,文学和文学家的地位并不高,王国维在自己的著述里大力提高文学的地位,认为“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3]90},而且从精神、教化和解脱等方面论证了文学的价值和地位。关于文学的内容,王国维不仅主张文学应该描写人生,而且强调这人生应该具有现实与真实的品格。对此,赵炎秋进一步指出,“王国维对文学内容的要求,无疑是有利于叙事文学的发展的。”^{[3]104}叙事的形式和技巧是具体落实叙事思想的操作层面的问题,王国维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古雅说”,对于其价值,赵炎秋认为王国维的古雅说强调形式,强调好的表现形式与好的审美对象几乎具有相等的地位,这对于推动我国叙事文学技巧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在关于文学形象这一叙事文学的核心话题上,针对王国维提出的“隔”与“不隔”的观点而学术界又见仁见智争辩不清的问题,赵炎秋联系王国维的整体文艺思想,明确指出王国维提出的“隔”与“不隔”说的实际上是形象问题。所谓“隔”,便是“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所谓“不隔”,便是“话语都在目前”。王国维“要求文学塑造出鲜明的形象,反对形象模糊,‘终隔一层’的作品”。^{[3]117}这一简要分析,如拨云见日,给人启迪。

梁启超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地位与声望在当时举足轻重,他的叙事思想同样影响深远。赵炎秋从梁启超的小说观、文学形式观、史传文学观

和叙事诗观等四个方面加以了阐述。小说是叙事文学的主要类型,但19世纪以前在中国一直不受重视,直到梁启超等人掀起小说界革命以后,小说的地位才大幅提升。梁启超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有“支配人道”的“不可思议之力”^{[3]123}。这种带有夸张色彩的小说观为当时人所接受并促进了近代中国小说大潮的兴起,对于中国叙事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同样,在分析梁启超的文学形式观、史传文学观和叙事诗观时,赵炎秋秉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梁启超的深刻与偏颇之处一一剖析。比如,指出梁启超倡导文体的“绝对的自由主义”和文白夹杂的文字表达观是欠妥当的,而关于成熟的语言需要历史与文化的积淀的见解又是十分深刻的^{[3]130}。如此分析,辩证而公允。

报刊语境、读者意识与近代叙事思想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潘桂林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从变化的背景、影响及表现三个层面进行从外到内、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的探讨,逻辑思想清晰,理论视野开阔,对一系列前沿性问题的解读相当精辟。比如潘桂林认为,媒介、读者意识与叙事策略之间存在着深层的动力关系,小说叙述策略受制于读者意识,而读者意识又受制于小说的传播媒介。在仔细考察了读者意识与近代小说文体的雅俗之变时得出,“早期新小说嫁接高雅主题和通俗形式,形成外俗内雅的严肃小说,后期新小说重拾典雅诗文和缠绵情事,形成外雅内俗的游戏消闲小说。”^{[3]223}而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危机,以及小说媒介载体,接受语境的整体变化,造成了读者意识的复杂转型。对于前人的一些影响深远的观点,潘桂林并不盲从,而是实事求是地予以剖析,比如在分析冯梦龙和静恬主人对于小说的见解时,既肯定了他们对小说审美教育功能的深刻认识,又指出他们“没有考虑到文本的交谈性质和读者的创造性地位,导致了小说单向传输和直接教诲的话语方式”。^{[3]156}一语道中,体现了一个学者缜密的思辨力。

明清叙事思想最具体的体现还是在小说文本上,为此,赵炎秋选取了能够代表明清小说叙事艺术的两部名著《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来进行论述。在论述思路,赵炎秋超越了传统的从题材、主题、人物形象到表现手法逐一进行分析的现成模式,运用先进的叙事理论,紧扣文本,从叙述层与叙事者、预叙和复调等方面来分析《红楼梦》的叙事艺术,这种切入的思路从源头上保证了研究的新颖度和先进性。具体论述时,面对繁复的文本,在科学

周密的研读后,发现规律,化繁为简,提出新观点,将《红楼梦》的叙事分为故事叙事和背景叙事,并一一加以剖析。作者不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上,还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将《红楼梦》提升到整个中国古典小说的宏观座标上来进行观照,从而指出,《红楼梦》叙述层的设置与安排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具有代表性。它既体现了中国文化与中国小说的基本特点,也体现了曹雪芹高超的叙事技艺。“多层叙述的结构方式,为小说的史诗性内容提供了广阔的叙事空间,使小说中的人与事获得了广阔的活动舞台,使小说内容获得一种时间与空间的永久性,从而增强了小说意义的普遍性与持久性。”^{[3]264}这一富有涵盖力的结论令人信服。

《海上花列传》是一部深受鲁迅、胡适、刘半农等人称赞的清代白话通俗小说,赵炎秋认为其叙事艺术“独步一时”,并从叙事风格、叙事结构、人物塑造和叙事手法等四个层面进行了分析。其分析切中文本实际,简要而具有创意。分析叙事风格,先用“平淡自然”进行总括,再从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平淡风格的表现方式及其艺术魅力等方面逐一阐述。分析叙事结构,提出了“断片式缀段体结构”的概念,并将其与《水浒传》、《儒林外史》的单元式缀段体结构和西方小说的拼贴式结构进行比照辨析。分析人物塑造,侧重从原作者的人物创作观及其在创作中的表现等方面进行论述。分析叙事手法,则从写实、白描、多层显现、由表及里和关键之处等方面逐一举例阐述。言之在理,持之有据。

毫无疑问,赵炎秋、陈果安、潘桂林的这一具有开拓性的成果,必将成为研究明清叙事思想乃至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一个新的起点,一个成功的范式。当然,他们并没有把话说完,一个民族的叙事思想是一个难以穷尽的领域,还有很大的学术空间留待有心人去研究。

参考文献:

- [1] 罗 钢.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 [2] 杨 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0-16.
- [3] 赵炎秋,陈果安,潘桂林.明清叙事思想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卫 华